

110 YEARS
大公報
一九〇二年創刊於香港

大公報 110 周年

古代曾有「程門立雪」求師教的故事，這故事於我的感悟是去找今之「程門」，就是投身於《大公報》所受的教育、培養，令我終生不忘。回首前塵，我離開《大公報》後，不論到大學任教、到文學單位從文、或個人從事文化活動，畢生都不忘記在《大公報》所受的教育。

曾敏之

曾敏之：大公報培育終生不忘

回首當年，我從廣州半工半讀開始，已歷浮生七十年新聞工作和文學活動的生涯，其中先後有二十多年是與《大公報》結緣的。但是我認識《大公報》卻遠在一九三五年。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野心，繼「九一八」事變之後，更進一步企圖擴大對中國的侵略，民族危機加深，救亡運動風起雲湧。我於工讀過程中，常到設立於廣州永漢路的生活書店和廣東中山圖書館閱讀報刊，看到由北方運來的《大公報》。《大公報》是呼籲團結抵抗日本侵略最力的權威報紙，發表的評論助我對時勢的認識。我幼稚的思想萌發了羨慕新聞記者的職業，希望做記者。當鄒韜奮先生一九三六年到香港辦《生活日報》時，我得到周鋼鳴表兄的介紹去香港拜見鄒韜奮先生，想入《生活日報》做校對。只因《生活日報》停刊，還回上海，因而未能如願。

感受「程門」教誨

說來卻是機緣來了。我的好友陳凡兄以他的才華，品德修養很受《大公報》領導的器重，於一九四二年為我推薦給胡政之先生，得到胡先生的接納，以不須考試就分配於桂林《大公報》任文教記者，能列為《大公報》的成員，令我感到榮幸，因此勤奮工作，更自覺學習以求適應《大公報》對記者的要求。《大公報》是以「不黨、不賣、不私、不盲」為辦報社訓的，我默察過去《大公報》的領導人胡政之、張季鸞以及加入《大公報》的長輩或同輩，沒有不恪守社訓「四不」精神從事工作的。當我踏入《大公報》之門，又從陳凡兄講述主持《大公報》筆政的總編輯張季鸞先生向編輯、記者告誡的一番話……

「我們常有一種覺悟，就是要做一個完善的新聞記者，必須由做人開始，個人的人格無虧，操守無缺，然後才算具備一個完善的新聞記者的基礎。」這是我於《大公報》「程門」感受到的十分深刻的教誨。

接着，又從季鸞先生提示，做新聞記者必須勤於學習，掌握各方面的常識，尤其以歷史知識為重要。他推薦應讀的史地圖書，從古典的著述下研讀的功夫。他是言傳身教的。後來我了解他的歷史，他曾留學日本探研世事，又從經學大師劉古愚學習治經世之學，對《資治通鑑》、《文獻通考》、《讀史方輿記要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以及《新五代史》、《明鑑》……等都曾博覽精研，具備國學史學的深厚修養，精通中外因而他主持筆政，撰述政論，成為最傑出最崇高的政論權威。

我那時還年輕，領悟季鸞先生「程門」施教的影響，我對學

習歷史有了自覺的追求。

但是有了一點歷史知識，僅是基礎，還須記住季鸞先生提的做人問題，人格、操守不能有失，要有膽識體現無缺的德性。季鸞先生論政的膽識是卓越的，堪稱典範。

膽識卓越張季鸞

我從研讀季鸞先生的《文存》中看到，他曾斥責汪精衛變化無常政客的行徑，終於以賣國漢奸遺臭萬年；看到斥責蔣介石於北伐勝利後大肆屠殺革命群眾和共產黨人，名之「清黨」的罪惡；更看到蔣介石與宋美齡結成政治婚姻時，蔣揚言「有美滿的姻緣始能為革命工作」，「深信人生若無美滿姻緣，一切皆無意味」……季鸞先生撰文斥責蔣介石忘了北伐犧牲五萬戰士，他們的家庭為革命拆散了，「兵士殉生，將帥談愛……繁榮河邊之骨，淒淒夢裡之人，人生不平，至此極矣。嗚呼！」

不論是汪精衛、蔣介石，當年都是權傾一時的人物，季鸞先生毫不畏懼，以膽識斥責他們，而汪精衛的可恥下場，證明季鸞先生的知人論世，真知灼見。他的生平，於辭世震動全國時，周恩來鄧穎超沉痛悼唁，認為季鸞先生「謀國之忠，立言之達，尤為士林所矜式」。

從《大公報》的歷史看，繼季鸞先生論政風格之後，如王芸生、徐鑄成、楊歷樵、李純青、李俠文、蕭乾、楊剛……皆擅於撰述政論的專家，可以說都承傳了季鸞先生的學養膽識而著稱於世，構成《大公報》輿論權威的傳統。

辦報奇才胡政之

在《大公報》任記者的漫長歲月中，還有值得懷念的是，在擔當總經理的胡政之先生的策劃經營之下，為《大公報》樹立馳譽海內外盡了他傑出的辦報奇才，與季鸞先生堪稱雙傑。全館員工經歷抗日戰爭被毀了津、滬、漢、桂五館的災難，不論處境如何艱困，政之先生能以身作則與大家共渡時艱，團結無間。辦報是文人集聚之所，《大公報》人卻無文人相輕，私心謀譽之弊，正是「四不」實踐所達成的全國報業所難做到的境界。

回首前塵，我離開《大公報》後，不論到大學任教、到文學單位從文、或個人從事文化活動，畢生都不忘記在《大公報》所受的教育。《大公報》歷一百一十周年，輿論、報業的盛譽傳播世界，至今的香港《大公報》在費彝民先生過去主持之下，為港，為祖國持有傳統精神，長期來愛港愛國引領輿情為促進和平統一進程作出貢獻，真正「實至名歸」，我這個老記者與有榮焉。

陳楚雄：報館像個大家庭

本報記者 王志民



◀ 陳楚雄（右）與趙鴻鈞在一起

▶ 1947年春節上海《大公報》員工茶話會



1951年的一天，上海冠生園飯店熱鬧非凡，時任上海《大公報》總編輯王芸生正在主持婚禮，新郎是上海採訪課記者陳楚雄，王芸生幽默風趣地說：「楚國之大雄，我喜歡。」原來新娘的名字叫余悅，引得滿堂大笑。年逾93歲的陳楚雄講起當年婚禮時的情景仍然歡笑不已，滿眼的幸福。

已經是第三次來看望陳楚雄老人了，我和趙鴻鈞等人一進門，他就喊我「小王又來了，你們快坐快坐。」陳楚雄從2008年開始身體機能開始衰退，日常生活完全需要他人照料，從那時起就一直住在上海中山醫院治療。

難忘深刻採訪經歷

陳楚雄1948年畢業於清華大學，在老師費孝通的推薦下，陳楚雄進入上海《大公報》工作，當時的《大公報》在上海灘位居三甲，社會普遍認為《大公報》地位高，以能在《大公報》工作感到自豪。陳楚雄說：《大公報》工作穩定，福利也比較好，供應食宿，早晚有車接送。

陳楚雄說：那時同仁相處融洽，宛如一個大家庭。王芸生總編輯雖然平時不苟言笑，但也風趣幽默，大家過得非常開心。《大公報》作風正派，最大的成就是培養了一批年輕的人才。他說，《大公報》記者會寫「本報訊」消息是不夠的，還要能寫特等題材。趙鴻鈞當時是在編輯部負責通聯工作，那時上海編輯部和採訪部分在兩處，編輯部在民國路261號（現在的人民路），陳楚雄所在的採訪部在南京路212號。他笑對陳老說，那時常看到陳楚雄來編輯部寫稿。

最為陳楚雄難忘的是採訪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經歷，1952

年，人民英雄紀念碑修建委員會成立，開始動工修建，時任《大公報》記者陳楚雄被報館派到山東採訪，青島浮山盛產花崗岩，被選為人民英雄紀念碑碑心石。陳楚雄說：那年冬天，投入300多人開採工程，碑心重達104噸，從採石場運抵青島火車站短短的13公里就用了38天才走完，由於當時鐵道路基和橋樑最高負荷不能超過100噸，還把「碑心」減到94噸，火車以時速20公里的速度安全運抵北京，直到1954年3月7日，在蘇聯專家的協助下，會同中國專家將「碑心」用了七套滑車安裝到一個厚15厘米的鋼筋混凝土筒上，光潔的「碑心」上刻着毛澤東親筆寫的「人民英雄永垂不朽」八個金光閃閃的大字得以正式落成。

盼內地復刊《大公報》

當年上海《大公報》與天津《進步日報》合併，陳楚雄隨後進入天津《大公報》和北京《大公報》工作，一直工作到「文革」開始。

他憶起當年夫婦倆被劃為「右派」和「右傾分子」，同在《大公報》工作的夫人余悅和一批《大公報》老人被遣送去黑龍江東部農場——北大荒勞改農場。1958年六七月間，《大公報》一批人員被下放到貴州省，陳楚雄也在內。余悅因此得以早日離開北大荒，隨陳楚雄下放去了貴陽，這一去就是三十多年。

陳楚雄說：「也是在那時下放貴州，小兒子陳世炬有機緣在國務院辦公廳工作。」陳楚雄當時被分配到工廠出黑板报，他說自己從未離開過新聞戰線。

沒說幾句話，陳楚雄又提起記者第一次去看望他時追問過的話，問道：「《大公報》能不能在內地恢復起來？」趙鴻鈞附和着說：「我們都盼望有一天可以看到上海《大公報》復刊啊。」

▼曾敏之（右）與徐開壘（左）探候巴金



▲1956年，年僅24歲的高肖笑（前左）在外事採訪活動後，獲周恩來總理接見

人才濟濟、群賢匯聚，是《大公報》長盛不衰的重要基礎、特色和優勢。110年來，這份中國新聞史上歷史最悠久的報紙，一直廣受全國新聞工作者的重視、愛慕和追捧，不少人更是為能有一日成為「大公公」而終身榮耀。我母親高肖笑，就是其中一位。

那是23年前的一個深夜。母親把我從睡夢中叫醒，她興奮的告訴我：「今天，香港《大公報》社長楊奇找我談了，她讓我盡快調到《大公報》擔任駐上海高級記者，並且着手籌備《大公報》上海記者站。」我望着母親的高興勁頭，知道這是她朝思暮想的一天，也是她三十七年新聞生涯的一個新里程。

母親是1949年從浙江溫州考進復旦大學新聞系的。這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大學生。從1953年開始，她就獻身於上海市委機關報《解放日報》。從那年起，直至她最後遠行，母親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兩份報紙：《解放日報》和《大公報》。

大公報關上海專欄

母親當了一輩子記者。幾十年來，她撰寫了成千上萬篇新聞報道。她採訪的對象上至國家領導人、外國元首，下至普通市民、家庭婦女。從七十年代初期，她長期聯絡上海的商業、財貿等經濟領域，在上海的新聞界可謂領軍人物。可她與《大公報》的不解之緣，卻是一次她的香港之行開始。

1988年，母親正好有機會赴香港採訪。經她的同班同學、時任《大公報》副總編輯唐篤時的引見，母親見到了剛剛出任《大公報》第二任社長的楊奇。楊奇知道她是《解放日報》的資深記者，馬上熱忱的邀請她為《大公報》撰寫稿子。生怕我母親不允，楊奇親切地說：「寫反映上海新貌的，寫體現港滬合作的，寫描繪風土人情的，你寫一篇，我這裡就用一篇。」

從那時起，《大公報》開始刊登了來自上海的新聞，並開闢了上海專欄。這些來自上海的文章刊登後，常被其他媒體轉載。《大公報》的讀者也逐漸知道了報社有一位上海的特約記者叫高肖笑。

寫着，寫着，母親越來越鍾愛《大公報》；她與報社編輯部的許多同事也越來越熟悉了。楊奇很快決定成立上海記者站，並動員她出任首任站長和高級記者。就這樣，1990年，我母親在58歲那年，離開《解放日報》，成為了《大公報》正式一員。

一身數職幹勁十足

完全是白手起家的上海記者站，母親十分投入，她約稿、採訪、編輯和經營廣告，一身數職，什麼活都幹，幹勁十足。有一天星期日下午大雨，家裡來了不少客人，可母親卻急着外出，當客人問她：「你星期日也要採訪？」母親回答：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需去報道。《大公報》是沒有星期日的。」話才落地，她已匆匆的消失在滂沱大雨之中。

母親十分節儉，一分一厘都為報社考慮。她與干谷一起，一邊採訪撰稿，一邊經營廣告，以後，記者站升格成了辦事處，《大公報》在上海的影響也更大了。

1996年，母親在為《大公報》工作了七個春秋之後。因為年齡關係，她離開了報社。可就在她一年後身患絕症住進醫院治療和搶救的最後時刻，她依舊念念不忘《大公報》和那些曾在《大公報》一起共過事的香港同事。每天都要我把當天的《大公報》送到病房。在她人生的最後兩個星期，她顫顫抖抖的給我一張名單，整整齊齊寫着20多位好友的姓名、單位、地址。她要我保持與這些好朋友的聯絡，以後有空要代表她去看望他們。我母親有着深深的「大公」情，如果她知道今天《大公報》的輝煌成就、社會影響和責任擔當，她一定會為當年有幸成為《大公報》一員而更為自豪、驕傲。



▶ 1998年9月，高肖笑在醫院病床上與本文作者合影。這是她生前最後一次照相，兩周後她遠行了

屠海鳴